

中国地名 拼写法研究

曾世英

ZGDM

测绘出版社

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

曾世英

测绘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扼要地论述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我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必要性，并着重介绍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拼写方式。同时指出“威士忌式”等外来拼写法必须淘汰。

本书可供新闻出版编译工作者、关心文字改革工作者和地学工作者参考。

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

曾 世 英

*

测绘出版社出版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1168 1/32 · 印张 6 · 字数 156 千字

1981年3月第一版 198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10 元

前　　言

人们的社会活动离不开场地，为了有所标志和识别各种地理事物，便于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就产生了地名。

地名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呢？首先借助于语音，有了文字又可以书写。语言和文字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地名有三要素：音、形、义，即语音、字形和意义。一般来说，不管哪个地区或哪种语言的地名，在谈话里或广播中，只要把声音说对了就可以知其所指，这是音的作用。如果用文字书写，那么，在文字形式相同的场合，即使读音不同，还可以互通通用。例如我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的地名，在用汉字书写时，由于文字形式相同，可以互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用拉丁字母拼写文字的国家，他们各自的地名，即使相互间的读音有或近或远的出入，还是相互照用。如果文字形式不同，就产生隔阂。例如用汉字、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等书写的地名，因为文字形式不同，对不同文字的读者就不能相互看懂。这是形的作用。如果对不同语言的地名照意义来叙述，那么，有些地名虽然可以有相同的解释，但有些地名还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另外一些地名即使在当地也不知如何解释。这是义的作用。所以概括的说，地名的三种表示方法中，音的作用最普遍、广泛，字的作用有时受到限制，义的作用则范围最狭。但在国际事务中，包括新闻报道和学术交流，地名的文字作用，比之语音更为深入、广泛，因之形的作用转而占主要地位。

随着近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历史上的远方现在朝发夕至，而通过广播和电视，人们的一切活动，瞬间即可看到听到。因之我们日常接触的地名，也是由近及远，由少到多。地名在不同的语言文字中当然出现不同的形式，如果都照原文书写，谁也无法一一认读。但是，今天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已日益成为国际

上通用的文字符号，用它拼写地名，便于国际交流。不过同一地名，如果你拼你的，我拼我的，对于交流情况还是不利的。

因此，一个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文字的国家的地名，被另一个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文字的国家引用时，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少数惯用的称说外，不论读音有无差异，近年都是照搬原文。非拉丁字母国家的地名，只要本国有法定的或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也应互相照用，这是时代要求。我国以往没有自己的、法定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外人越俎代庖，各人各拼，我们随同使用，造成地名拼写上的分歧混乱，必须及时加以改革。

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第一个草案。以后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政协委员会组织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讨论，又经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反复审议和多次修订。1957年10月复经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于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登报公布。嗣后《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于1958年2月11日通过。

《汉语拼音方案》批准后，我国电讯业务上随即于1958年据以取代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邮电式拼写法。全国铁路系统也依据《方案》拼写站名。嗣后主要城市的路名牌以及气象形势在国际交换时的站台名都依照《方案》拼写。这是《汉语拼音方案》在地名拼写上的若干具体事例。

1958年敬爱的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谈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各种用处时指出：“可以在对外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同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主任指出：“由于我们还没有一个国家规定的汉语拼音方案，中国人名地名的音译，在对外文件和书报中至今沿用威妥玛式等拼法，既不正确，也不合理。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之后，这个问题就

* 1958年1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可以得到解决”*。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二十年了，无论从哪方面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外来拼写法都应由它取代。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鉴于地名拉丁字母拼写上的分歧混乱，从而在文化交流上、国际贸易上以及旅游事业上带来了困难和损失，议定推行“单一罗马化”。即各国的地名在国际场合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时要统一于一种拼写法。

1975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地名标准化专家组会议上，我国代表发言指出“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中国地名是我国的既定方针”。1977年在雅典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屆地名标准化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再一次阐明我国的主张：国际地名标准化要以各国地名标准化为基础，各国主权范围内地名的罗马字母标准拼写形式，应当作为国际的标准形式。经过斗争，我国提出的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的国际标准提案，以四十三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获得通过。

经过多年酝酿，“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已于1978年9月由国务院批准，并由外交部、新华社通令国内外于1979年1月1日起实行这一改革。到此，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的地名，对内对外的立法手续都已完成。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完成任务，并通过实践以求完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论人口汉族是多数，论面积少数民族分布较广。在广阔的国土上有千千万万个少数民族语的地名。以往我们对于少数民族语的地名，基本上采用汉字音译，但汉字是固定的音节文字，在表音上有局限性，而

* 1958年2月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 1978年8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外交部、中国地名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的请示报告。

汉语拼音字母代表音素，可以灵活拼音，更好反映原语的音。不过《汉语拼音方案》是为汉语设计的，怎样用它拼写少数民族语的地名呢？为此本文以较多的篇幅探讨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拼写问题。

今天在国际事务和民族关系上，我们不能把地名仅仅看作是地理上的一种普通标志，而必须体现国家的政治立场、领土主权和民族政策。因此，如何做好地名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地名属于语言范畴，笔者对语言学未曾涉猎，但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六十年代曾以“我国地名拼写法的试验”为题，写过一份初稿，但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这份初稿后无下落。残稿整理后，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周有光同志多所指正，在重写过程中又承测绘科学研究所地名室的同志们提供资料和交换意见，其中杜祥明、孙竹同志协助尤多，特此志感。

笔者

1979年7月

目 录

前言

(一) 拼音地名的用途	(1)
(二) 汉语拼音字母在地名拼写上的优越性	(9)
(三) 音译转写法的制订过程	(18)
(四) 音译转写法中的基本问题	(26)
(五) 少数民族语地名拼写法的表音深度问题	(38)
(六) 关于同名、同音地名的处理办法	(44)
(七) 地名的分词连写法	(49)
(八) 国际上地名的拼写和读音	(60)
(九) 国际上对我国地名的拼写情况	(65)
(十) 关于旧邮电式地名拼写方面的问题	(73)
(十一) 关于“威妥玛式”地名拼写方面的问题	(77)
(十二) 从外国地名的拼读法检验音译转写法的拼读法	(84)
(十三) 由地名的拼写法略谈地名的翻译法	(92)
(十四) 问题的讨论	(101)

附件

一、维吾尔语地名同词异译资料	(110)
二、蒙古语地名同词异译资料	(122)
三、汉译维的长地名资料	(135)
四、汉译蒙的长地名资料	(149)
五、英国地名分段拼写情况统计	(166)
六、欧美出版的地图上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我国 地名的情况	(174)
七、拉丁字母在各语种中使用的用情情况	(178)
八、几种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	(182)

(一) 拼音地名的用途

我国地名在对外文件报刊中用拉丁字母拼写时，过去基本上沿袭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外来拼写法。《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要依据它来拼写我国的地名，其中既有汉语的地名，又有少数民族语的地名，既有对外工作上的需要，又有国内工作上的需要，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在促进或推动这项改革的时候，必须重视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此这里先提出应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地名的若干方面，以便探讨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国际事务方面

当前国际上对地名拉丁化的趋势是：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的国家，除个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惯用译名外，一般是相互直接引用的，即本国怎样写，别国照样搬过来用。在地图上甚至有把各国个别字母上的各种附加符号也端了过来的。对不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的国家，只要该国有自己法定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也在相互采用，以求统一。在交通日益便利的今天，如果国际通讯中电报局名和国际航空站名一名多写，同时并存，势必带来工作上的困难。这里应当指出，邮电局名是国家规定的，由国外寄信发电到我国，必须依照我国邮电总局规定的局名拼写法书写，否则会导致延误。我国邮电局名在国内已于1958年扬弃了由前清末叶起早已惯用的旧邮电式拼写法，遵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邮电局所名称，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忽视。

解放前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从外文译汉文，至于从汉文译外文的工作，那多半出于外国人研究汉学的兴趣和需要，主要由他们自己来搞的。解放后情况不同了，除了马列著作、科学技术和新闻报导上仍有由外文译汉文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外交流学术文化，特别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及介绍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因之有了大量由汉文译外文的任务。与此同时还有直接用外文书写的文件或学术论著。在这些对外写作中遇到了我国的地名，在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中，要不要有个统一的拼写法，还是在不同的文种中采用不同的拼写法呢？以往外国人用拉丁字母拼写我国的地名，在不同的文种中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拼写法。今天是我们自己作宣传介绍，根据名从主人原则和国际惯例，理应统一起来。否则同一地名，一会儿这样拼写，一会儿又那样拼写，有谁会知道是指同一地点还是指不同地点呢！由地名构成的专门术语如果随之改变，又谁会知道是指同一事物还是不同事物呢？

有人说我国对外文件和报刊的作用，主要在于介绍主题内容，地名不是宣传介绍的对象。许多地名的过去拼写形成已经惯用，一旦改变，读者会感觉生疏，因之主题思想会被冲淡。其实，除了常见的、特别重要的地名外，一般的地名不仅各种外文里有各种不同的拼写法，即使同一种外文里也有不同的拼写法（参阅本文之九：我国重要地名不同拼写法比较表）。何况一般读者对本国以外的地名，尤其是对不同语系的地名，多数是陌生的。这些地名改用新拼写法还是沿用旧拼写法，对多数读者、多数地名来说，是无所谓生熟的。至于新出现的或偶尔出现的地名，用这种拼写法也好，用那种拼写法也好，更是不分生熟的。当然，对少数常见地名的拼写形式，如果没有政治原则问题，还可予以括注，以便过渡，例如北京写 Beijing (Peking)。

所以笔者认为，不论从技术角度出发，还是从客观存在出发，分歧的地名拼写法是终究要统一的，而统一的标准只能是我国国家的规定。从政治角度出发，像现在我国地名在不同文种里拼法不同的情况，不容否认，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帝国主义者窃取我国邮电、交通、海关以及一些文化机构的管理大权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侵略的残余迹象，我们必须及早予以铲除。

2. 多民族大家庭的共同需要方面

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现除回满两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不少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各个民族相互引用地名时，除表示属性的部分常用通名和有些表示方位、大小、颜色等修饰语有时从义外，其余一般是从音的。在有文字的民族之间相互引用地名时，为了提高表音的准确性，最好从原文直接音译，而不宜通过其它文字的译名转译，尤其因为汉字在表音上有局限性，更不宜从汉字译名转译。但是各种语言地名的原文，除汉语地名外，一时尚无足够的资料，特别在新闻报道时，由于时间的限制，对各种语言的地名如果都要及时提供原文，即使今后也是有困难的。为此利用汉语拼音字母在表音上的优越性，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少数民族语的地名用汉语拼音字母做好音译转写工作，对于民族之间用各自的文字相互译写地名时，就有较好的依据。

现在我国的地名，不论是汉语的还是少数民族语的，在国家的基本地图上和广泛流行的地图上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在新闻报道时和多数的出版物上也是用汉字书写的。这些用汉字书写的地名，除汉语地名当然作为少数民族文字中音译的依据外，也许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之间相互音译地名时也可据以转译。笔者认为由于汉字长于表意，拙于表音，因此即使原译者认真译写，有些译音和原音会有出入。至于因为长期没有译写规范，各人各译，再加上汉语方言和民族语方言错综掺杂带来的分歧混乱，更使汉字音译的地名降低依据的作用。汉语拼音字母代表音素，可以灵活拼音，并且读音统一，虽然跟记音符号例如国际音标相比，在表音上还不够精密，但和已经推行的或将来改革的并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设计的少数民族新文字中的字母是接近的。正因如此，即使仅仅如此，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地名，包括汉语的地名和少数民族语的地名，可以作为兄弟民族语言之间相互音译的依据或参考。就是说，例如用蒙文译写维语或藏语的地名时，或用维文译写蒙语或藏语的地名时，或用藏文译写蒙语或维语的

地名时，可以借助汉语拼音字母来摆脱汉字音译地名在表音上的失真，从而提高相互之间的一致性。至于将来各个民族都进行拉丁化文字改革以后，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地名，可在各自的文字中对其他民族语的地名，在文字形式上取得相同或相似，则更是意义深远的。

为什么说转译地名必须有较好的依据，举例说明。1961年我国女子登山队登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7719米高峰后，《人民日报》作了报道。为了及时转载，《新疆日报》维文版在乌鲁木齐市一时核对不到维吾尔语的情况下，只有从汉字译名“公格尔久别峰”倒填维文。据说，读者见报后纷纷写信询问，似乎这个要在世界上闻名的高峰在新疆反而不知道在哪里。其实这个高峰在新疆是大家知道的，柯尔克孜语叫 [g'ongbur tōba]，意思是紫色的山峰。如果用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作 Kongur Töbä 或 Kongur Tobai，并在报纸上报道消息时括注在汉字译名之后，那么，闹的这一笑话不仅在倒回维文时可以避免，其他兄弟民族文字中相互转译时，也可以既快又好地解决。

再如集二铁路线上“二连”这个地名，原从蒙语音译，但译音不准。解放初期有个学院的地理系师生到那里实习，据说从当地不讲汉语的蒙古族居民中间就问不到这个地方在哪里。在蒙古语中这个词意为斑纹，是形容地理景观的常用词，如照蒙语地名音译转写法写作 Eren，那就不致问不到、听不懂。现在改称“二连浩特”，蒙语中“浩特”意为城市，本来整个地名在蒙语中意义很明显，但因前半段表音失真，对蒙语读者来说，就有点别扭。其他少数民族如果从汉字译名转译，也是面目全非。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汉字文件、书报中，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只用汉字书写，并且这种办法还要长期存在。事实证明，在某些场合，如果采用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或者在汉字译名后加以括注，那对原语原音的了解，会带来不少便利。后一办法的好处，正如书报中对生僻汉字曾经括注汉语拼音一样，

可以起正音作用，甚至对少数不符合实际的译名还可以起纠正的作用。

3. 地图测绘和地名调查方面

我国国家基本地图上的地名是用汉字注记的。汉语地名当然要用汉字注记，少数民族语的地名现在也只有汉字可用，因为如果采用民族文字注记，文种不少，即使酌用几种使用较多的文种，读者也不会一一认识。但凡是在野外用过地图的人都有个经验，那就是在少数民族语言区域的地图上的汉字译名，特别是中小地点的译名，有一部分到当地是听不懂、问不到的。其原因，除受了汉字在表音上局限性的影响之外，还由于汉字存在不同的方音读法。如果地名调查者不按汉字的标准音，而按自己的方言，那么，换个人来念，听不懂、问不到是必然的。

在少数民族语言区域的测绘工作中，为了避免汉语和少数民族语两种语言的方音掺杂一起带来的差错，从1961年起采用汉语拼音字母记音和要求当地提供民族文字及其意义相互参证的办法，进行地名调查和译写。这样，地图上的汉字译名不仅在表音上，而且在克服混乱上有了显著改进。但汉字译名本身并没有摆脱汉字表音的局限性。为此，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地名调查实践的基础上，于1965年提出了几种《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草案）》*。在1974年出版的汉语拼音字母版比例尺为六百万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维、蒙、藏语的地名就是依据这个《草案》音译转写的。地图出版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字改革委员会组织有关方面讨论，认为这张地图今后不仅在外事工作上能发挥它的作用，同时对不识汉字的维、哈族群众也是极为需要的。

汉语地名的地方用字如𠂇(ao)、癿(bei)、𢃥(kuang)、岱(tan)、迺(zhan)等，多读字如河北省大城县的大字要读 dai，安徽省六合

* 见《文字改革》月刊1965年五月号。

县的六字要读 lu，陕西省瓦窑堡的堡字要读 bu，其它各省地名中的堡字读 pu，而碉堡的堡字读 bao，江淮一带地名中的圩字读 wei，粤桂一带地名中的圩字（由墟字简化）读 xu 等，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后，都可提供准确的读音。

地图是集中地、成批地、类别分明地、方位明确地出现地名的场处，地图上的地名工作做好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中小地点的少数民族语地名一旦见于地图，就会被各方面采用。所以即使目前地图上的地名只用汉字注记，但汉语拼音字母在地名译写规范化上所起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汉字的正音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我国国际声望的提高，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了解中国，学习中国。为了正确介绍中国的疆域范围、地理形势、建设成就，我们应当编绘出版用拉丁字母拼写我国地名的地图。做好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地名的工作，也是为此服务的。

4. 快速检索和文字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方面

索引是情报和技术工作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地名索引又是各种索引中繁重的一种。举例来说，在一般参考用的我国地图上，现有地名三万到五万个。在查阅地图以前，如何确知地图上有无某一地点以及它的位置，提高查阅的效率，地名索引起着节约时间的作用。在较详细的小比例尺地图上，我国地名可达几十万个，要求快速检索，必须有一套用科学方法编排的、使用便利的地名索引。在实测的全国基本地图上，地名的总数有多少，尚无统计，但必然是以千百万为单位计数的。在浩如烟海的地名中，如果要求在短时间内查到某一具体地点，没有地名索引或地名录，是有困难的。其它方面如地名档案等，也同样有快速检索的要求。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地名，由于拼音字母有简单的、公认的次序，就具备了这一条件。在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的新时代，这个条件尤其重要。

在机械化自动化时代，文字工作必须走向机械化自动化，这

就要求文字的符号单元不宜过多，这是公认的事实。今天广大劳动人民要求提高文化，为此都在呼吁简化汉字和精简字数。但汉字字数无论如何精简，估计还要有好几千个，这是不符合机械化和自动化要求的。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地名，对将来的拼音文字提供了大量的拼音词汇，因之可以说它既是为了地名的快速检索，又是为了给拼音文字做准备，是一举两得的。

5. 以地名组成的专门术语的构词方面

有些学科中的专门术语，主要是生物学方面的学名，为了表示发生或发现的地点，在国际上依照林奈命名法*，有不少是以地名作为构词素材，加上拉丁文的前缀或后缀或外文组成的，例如：

古生物名称中有：

Stegodon huanghoensis (黄河剑齿象，通称黄河古象)

Lufengosaurus (禄丰龙)

动物名称中有：

Lepus yarkandensis (塔里木兔)

Felis tigris mandshurica (东北虎)

植物名中有：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台湾杉)

Ilex formosana Maxim (台湾冬青)

此外，地质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一些专门术语，也往往以地名命名。例如：

地质学中有 *Wutai Group* (五台系)

考古学中有 *Yangshao Culture* (仰韶文化)

这些名称在各该学科中都有国际意义，以往这些名称一部分由外人订立，当然采用了国外的拼写法，一部分由我国学者订立，或凭个人习惯或从外来拼写法。因之采用我国地名作为专门术语的组

* 林奈 (Carl von Linné, 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他创立了生物学双名命名制，或称二名法。

成部分时，它的拼写法没有准则可言。今后我国地名的拼写法要统一于《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已经形成的名称术语要不要改动？如果改动，有关领域会不会认可？如果旧有的名称术语不动，只在新订名称术语时依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从而带来拼写体系上的前后不一致，又好不好？这里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些地名并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从属于专门名称术语的。如果改动，会造成错觉，或者被误认为所指的是另一事物。例如国际闻名的周口店猿人，古生物学中的学名作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pekinensis*，并可简称为 *Pekinensis*，其中 *Pekinensis* 是由地名北京的传统拼写法 *Peking* 加上拉丁后缀组成。地名北京在今后我国出版的地图上应拼作 *Beijing*，这是没有疑义的。古生物上这个名称要不要调整呢？笔者认为 *Peking* 这个传统拼写法，在当前以至最近的将来，在一定场合还会沿用，或作为副名括注，因之 *Pekinensis* 可不改。但如植物学中台湾冬青作 *Ilex formosana Maxim.*，其中用 *formosa*（福摩萨）来称说台湾，则是值得探讨的。所以在复杂的情况下，要对具体名称作具体对待。但是由于专门术语在国际学术论坛上提出时，要体现我国政治立场，今后我们自己用我国的地名作为构词素材时，不论原出汉语还是少数民族语，都应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以免分歧混乱，更是为了避免错误。

至于拼写体系上的前后不一致，则是从来存在，不自今始。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纯粹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科学事业飞跃猛进，以我国地名构词的专门术语也会不断地大量产生，在数量上会远远超出以往的总和。那么，即使残留了少数旧的拼写法，那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二) 汉语拼音字母在地名 拼写上的优越性

1. 《汉语拼音方案》的社会基础和科学依据

《汉语拼音方案》是在毛主席关怀、周总理重视和党的正确领导下，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的文字工作者不断倡议、试验的经验教训，再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后定案的。而六十年来我国文字工作者的倡议和试验，又受了三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在方案提出以前，进一步调查研究了全国的汉语语音情况，并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语音作为标准音。在方案的拟订过程中，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了不同的字母设计形式。方案制订以后，又组织全国及各省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有关人士进行了讨论和修改。这样周密、详尽、广泛、深入的工作方法，使《方案》既有社会基础，又增强了科学性。因此，应用它来拼写我国的地名，也是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科学依据的。

《汉语拼音方案》的优越性主要是符合我国语言的实际。中外语言里音位对立的主要差异之一是送气音跟不送气音的对立和清音跟浊音的对立。汉语里的音位主要是送气音跟不送气音的对立，而在西语里是清音跟浊音的对立。在《汉语拼音方案》以外的 34 种关于汉语的拉丁字母拼音设计中，17 种是外国人拟订的，17 种是我国个人或集体拟订的*。外国人拟订的 17 种中，从西语习惯出发，着眼于清浊音的对立，而把汉语里送气音跟不送气音的对立放在从属地位，表现在放着 b、d、g 三个字母不用，而在字母 p、t、k 上想办法，用增加送气符号‘或不加符号的办法来区

* 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1961 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